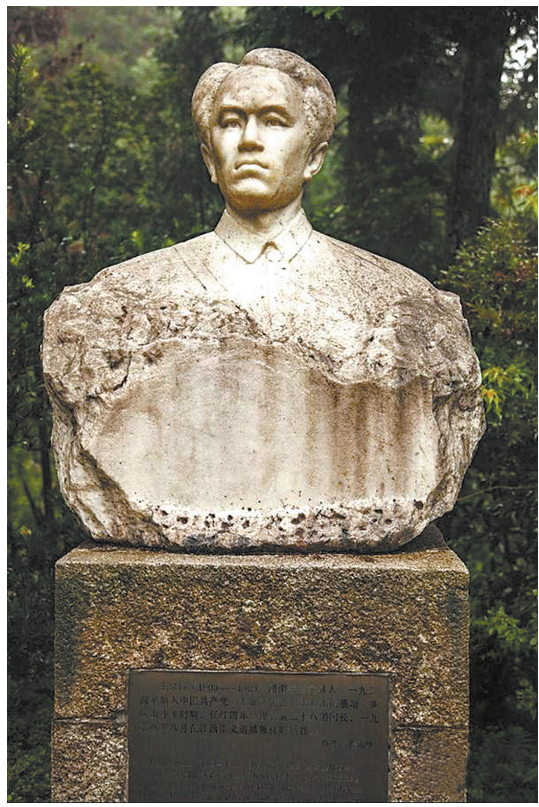


先烈血染大地红

纪念王尔琢牺牲九十五周年



井冈山的王尔琢雕塑像

崇义县思顺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指挥员王尔琢牺牲之地。在王尔琢牺牲95周年之际,笔者一行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来到位于思顺圩背虎形岭的王尔琢烈士陵园,深切缅怀王尔琢烈士。

“智勇双全震赣湘,为除叛逆以身軀。时逾半纪临君墓,如见英姿焕大荒。”凝望着20世纪80年代萧克将军在王尔琢烈士墓扫墓、凭吊时含泪写下的《谒王尔琢墓》一诗,英烈志士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犹如电影闪回一一呈现在眼前。

历史不会忘记,百年前的中国,硝烟弥漫,血泪斑斑,遍体鳞伤……1922年春,党领导长沙人民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斗争。透过历史的风云,笔者仿佛看见了在湖南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王尔琢,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的场景,他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抗议军阀的暴行;笔者仿佛听到了王尔琢的奋力疾呼:“劳苦大众穷困潦倒,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实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要实现劳苦大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实行革命,才能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1924年5月,王尔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笔从戎走上革命征途。在军校学习期间,王尔琢思想进步,各科学成绩名列前茅。1924年秋天,在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培养和介绍下,王尔琢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的巨浪中。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王尔琢留校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队分队长和党代表。1925年1月,担任国民革命军营长的王尔琢,参加了平息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显示了极强的军事能力。1926年夏,他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党代表……

1927年5月,时任北伐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的王尔琢给父母写了一封“托孤信”。“风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信中提到的风翠,是王尔琢的妻子郑风翠。王尔琢在家乡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王官桥村与郑风翠新婚五个月,便离家别妻赴黄埔军校就读。1927年5月,王尔琢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写信约妻到武汉团聚,却因形势的变化而错过了团圆。

在国家飘摇、民族危亡之际,王尔琢为何以鲜血和生命作出承诺与担当?答案就是,致力于工农解放和民族独立,是王尔琢始终不渝的信仰。“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王尔琢将一个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共产党人形象定格在天地间、铭刻在人们心中。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岁月,王尔琢与无数的革命先驱一道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道路。

在南昌起义石破天惊第一枪打响后,王尔琢颈系红领巾,臂扎白毛巾,率部打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在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后的三河坝战役中,王尔琢以“勇气先登势无敌”的胆魄,率部阻击敌人,完成了掩护部队安全转移的任务。

三河坝战役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一部抵达广东饶平以北的茂芝村时,得知起义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在这危急关头,王尔琢坚决支持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否定了“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意见。

起义军余部到达赣南后,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的追击,但仍然受到反动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部队军心涣散。行军途中,天天都有人离开。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军官,就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时任指导员的杨至诚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困难的局面:“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在朱德主持召开的排以上军官会议上,王尔琢坚决支持朱德提出的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组织整编和军事整训的决策,对开展“赣南三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天心圩整顿大会上,朱德、陈毅讲话后,王尔琢表示要蓄发明志:“革命不成功,不剃头、不刮胡子!”这一幕深深印刻在全军将士心中,官兵们在感奋、激荡与共鸣中,汇聚在党的旗帜下向着胜利迈进。

1928年4月,朱德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王尔琢任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成为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员骁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和红军的发展立下了殊勋。

位于永新县七溪岭脚下的龙源口大捷纪念碑的碑文,镌刻着一段永存史册的历史记忆,留下了王尔琢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的深深印记。

龙源口战斗一打响,老七溪岭制高点百步墩就被敌人抢先占领,战况对红军非常不利。在这危急时刻,王尔琢当机立断,组成若干个勇猛冲锋集群,向敌人发起猛攻,终于将百步墩拿下。接着,王尔琢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四面夹击敌军,全歼敌二十七团,继而又先后打垮国民党赣军第九军二十七师杨如轩,二十六师杨汉生等敌军,创造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王尔琢以出色的军事才干,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三、四次大规模“进剿”。

据《何长工传》记载,在红二十八团从湘南桂东途经崇义思顺重返井冈山的途中,二营营长袁崇全煽动一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逃跑,妄图叛变。王尔琢和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闻讯后,立即带领一营和教导队300多人,一直追到思顺圩。天还未亮,看到前面有所房子,王尔琢大声喊起来:“我是你们团长王尔琢,我同党代表接你们来了!”这时,袁崇全从屋子里开了枪,王尔琢当场中弹牺牲。

“崇义追叛徒,桂花落地黄。英年二十五,天地为悲伤。”1928年8月25日,叛徒的枪声和烈士的鲜血催醒了两个连的官兵,觉悟过来的官兵抬起了王尔琢的尸体,痛心疾首地回到二十八团。在官兵们的抽泣声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站在王尔琢遗体前肃立默哀,毛泽东悲痛欲绝地说:“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舒云卷秋,远山静默。在王尔琢墓碑上,镌刻着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新中国成立初期赣南的水上民主改革

□钟强 李吉耀



党史中的赣州

新中国成立初期,航运业在国家运输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家调运物资任务日益增多,航运业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但航运业长期受船帮、帮会等民间势力的影响,很难适应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亟待建立稳定、统一的航运体系,保证物资调拨运输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全国开展了水上民主改革。

与全国形势一样,赣南的水上社会形势复杂,亟待改革。赣南境内江河密布、流域宽广,章江、贡江、赣江及其支流流经赣南各地,构成以赣州港为中心的航运网络,东可沿贡水直通源流绵江,西能溯章水抵达大余,南可经蜿蜒至“三南”,北能从赣江顺流下长江。新中国成立前,船民和船工是水上航运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主要以水为生,以船为家,以水上运输为业,构成独特的水上社会。新中国成立后,陆地上的各种社会民主改革对水上人民有很大的鼓舞,对水上敌人也起到了震慑作用。由于水上流动性大和政府工作人员紧张等因素,仍有残留在水上的封建把头 and 反革命分子明目张胆或改头换面进行破坏。

1952年底,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江西省委、中共赣州地委先后召开民船工作会议,部署开展水上民主改革运动。在中共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赣州地委成立专区民船委员会,加强对水上民主改革运动的领导。专区民船委员会下设水上民改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秘书、登记管理、调查研究、宣传等4个小组。

1953年1月27日至3月底,为摸索经验,专区民船工作委员会在赣州港进行水上民主改革试点工作。赣州港由东门、建春门、涌金门、西门、江口、桃江、湖江等7个码头组成。专区民船工作委员会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工作队,在每个码头派驻一个工作小组,每组由7至13人组成,指定专人负责组长,负责领导小组具体工作。

根据“依靠船工和贫苦的劳动船民,团结一般船民和船主,打击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及走私贩毒主犯”的民主改革方针,工作队派出各工作小组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详细调查水上从业者的出身、历史及社会关系,进行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通过工作队思想工作以及召开诉苦大会,船工和船民将个体的遭遇和群体命运结合起来,建立共同的阶级情感,为开展水上民主改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一位老船民对工作队的成员



20世纪50年代赣州港龟角尾码头。(资料图片)

说:“我活70多岁,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人跟我说话、补衣服,这是毛主席教育得你们好啊!”

工作队通过调查摸底掌握情况,进行船舶户口申报登记和编队编组工作,进行船舶户口查对登记,固定港籍,发放船牌,加强水上控制。在赣州港试点工作,登记在港的船只共554艘,人口1576人。

同年3月1日,全区水上民主改革会议召开,传达上级有关水上民主改革的指示精神,介绍赣州港试点工作经验,研究与部署全区水上民主改革运动。会后,地、县共抽调256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各港船舶,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水上民主运动前后历时7个月,登记定港的船只共3409艘(含赣州港),最小的载重2吨,最大的载重111吨,人口9378人。广大水上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参政议政。

随着水上民主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船工与船民团结一致,树立起服务于国家航运事业的意识。船工和船民在旧社会社会地位低下,被称为“船拐子”“船狗子”。船工中存在吃喝嫖赌的现象。船民中也存在种种不同程度的恶习,如运送货物时经常掺沙掺水偷盗、隐藏土匪以致当土匪、蛮横互不团结、经常争吵以致斗殴等等。为了彻底消除船民和船工的旧观念,将船民和船民团结起来,工作队以工资改革为突破口,“根据过去的习惯和当前营业状况,由船工与船民协商解决,过低的工资适当提高”。通过解决困扰双方的工资

问题,船民和船工关系得到好转。

与此同时,新的工作队伍也逐渐建立起来。全区各县港口建立和健全航运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内河航运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广大船民,船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船舶户口制度也随之建立,让船民和船工有组织可以依靠。赣州港以原木船工派为基础,建立了航运工会。其他港口,则以运输互助组为基础,建立工会小组289个,还成立船民协会委员会11个,发展船民协会会员3316人,占登记人数的35%;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10个,委员93人,治安小组38个,组员231人。到1953年11月底,40%至60%的船民参加了船民协会。

在开展水上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改革了一些不合理运输管理制度。船民担负税费由21种减至8种,有关水上运输部门组织集体办公,简化运输手续,船舶在港装卸很久的“装三天,卸四天”的习惯规定被打破,出现“装一卸二”新气象。为了将分散的个体运输者组织起来,航运部门联系货源,由船民协会组织运输,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度,将以往个体经营的运输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为顺利调度物资,地委通过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召开工作会议,转达公私管货物部门的运输需求,再将任务分配给船民。船民除承接国家的运输任务外,还可以在农村地区寻找货源,促进物资流通。

水上民主改革将船民和船工组织起来,纳入国家领导的组织系统中,广大船工船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船舶定籍定港,船工船民生活安定,从而解放了生产力,逐步为有计划地组织运输以及对民船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到警卫连查铺

□李学文

1931年7月中旬,红十二军从宁都固村出发去宁都北部地区补给休整,当天晚上到达宁都的洛口镇,在南岭村宿营。

随红十二军来到洛口的毛泽东,晚上又要去部队查铺,这是他这几年带部队养成的习惯。军长罗炳辉说:“总政委,你一路这么辛苦,晚上下部队查铺就我们代劳了。”毛泽东说:“要说辛苦,战士比我们辛苦一百倍,人家的脑袋壳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家啊。首长查查铺可以更好地掌握和了解部队,你们也要坚持这一条规定。”于是,他们披着月色一同向警卫连连部所在的卢氏宗祠走去。

黑暗中,在交叉路口站岗的战士看到两个人影向祠堂这边走近,立即拉枪栓,警惕地大声喝问:“谁?口令!”

这一喝问吓了他俩一跳。罗炳辉有些尴尬,回答说:“战士同志,是我!”“你是谁?说口令!”战士喝问。“你们营连长知道口令,我哪知道?”罗炳辉说。“没有口令,站着别动!否则老子开枪了。”战士喝止。

罗炳辉有些恼:“别老子老子的,我们……”毛泽东按住罗炳辉,对站岗战士说:“伢子,莫紧张,是我哟,毛泽东!”

“黑漆漆的,谁知道你是谁?没有口令别靠近,小心吃枪子!”战士又喝道。

这时警卫连长从连部出来查岗,看到站岗的战士正在喝止前面两个黑影,要他们说口令,他立即拔枪,一个战术动作跃过土墙,躲在大树后。只听见一个瘦高个说:“伢子,我不知道你们连里今晚的口令。但我就是毛泽东,如假包换!”毛泽东往前挪了一步。

战士怒喝:“站住!我要口令!没有口令,我的枪不认人!”

毛泽东没办法,干脆往回走。警卫连长定睛细看,还真是毛总政委和罗军长,他赶紧走出来:“口令:南团。”

战士一听,立即收枪,立正敬礼。警卫连长走过去拍拍战士,责怪道:“你呀你呀……”然后快步往前,敬礼后说:“毛总政委,罗军长,对不起,我带部队无方,把战士带得太古板了。”

毛泽东拍拍警卫连长的肩膀,爽朗地说:“连长同志,你部队带得好,这战士古板得好,没有口令,谁都进得了营区,那我们的脑袋就不安全了哟。”

战士一听真是毛总政委和罗军长,心里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自己刚从老家宁都固村参加

红军,第一次站岗就幸运地碰到总部和军部的首长一起来查岗,害怕的是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挡了首长的路。

毛泽东紧紧握住战士的手说:“莫紧张,你做得对,我和罗军长不但不会怪你,还要表扬你。没有口令,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李泽东,就是不能进营区!”

毛泽东帮战士整理军服,说:“伢子,你上衣是军服,裤子是便服,是刚入伍的吧,哪里人呀?”

“宁都固村人,红十二军路过固村时参加红军的。”战士立正说。

“噢,是个固村伢子,晚上一个人站岗怕不怕呀?”毛泽东问。

战士挺直腰板说:“报告首长,红军战士死都不怕,还怕这个!”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有勇气有胆量能打赢白狗子!”说完就向战士住宿的卢氏祠堂走。

毛泽东从警卫连长那里要过警卫连战士花名册,对照人数,轻声轻脚地一个个点数。人数点清楚后,他又为熟睡的战士整理铺在篾筐上的稻草,帮小战士拉好盖在身上的破旧军衣,反复叮嘱罗炳辉要关心战士的生活,很晚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汪群:笔杆如刀的革命者

□杨小武 肖凡

在北京大学静园的北侧,矗立着一座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该碑是为了纪念在民族解放事业和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北京大学(含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师生而建立的。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位烈士的英名,在这之中就有江西籍烈士汪群。

汪群,江西贵溪人,1904年出生,1929年牺牲。1924考入北京大学学习,1925年5月在北大入党。1926年夏,被党组织派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地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候补委员、中共赣南特委书记。

江西大革命时期的宣传家

1919年,汪群考取了江西省立第一中学。这一年,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爆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汪群孜孜不倦地阅读《新青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其间,他经常与方志敏、袁玉冰、黄道等同志接触,接受了他认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江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汪群成为江西改造社的第一批社

员。他积极为《新江西》发表评议文章,批评时政,宣传新思想,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1922年,他在南昌组织发起贵溪社,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溪音》杂志并担任主编。

追求进步的北大学子

在北京大学建校27周年纪念文章《我观北大》中,鲁迅先生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1924年,汪群考入北京大学并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汪群遇到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李大钊以北大红楼为阵地,组织和领导汪群等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汪群在北大连续发表了“三·一八”惨案宣言以及“五卅”运动等多篇评论文章,是赵世炎主编的《政治生活》周刊的经常撰稿人和《一周时事》专栏编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汪群以无畏的姿态,仍常去向李大钊请教马克思主义。

披肝沥胆的革命者

1926年夏,党组织委派一批优秀的青年党员到

南方工作,汪群就在其中。1927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赣州惨案,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噩耗传来,汪群异常激愤,以笔为刀写下了《悼念我们的同志——陈赞贤》,向国民党反动派严正指出:“杀死陈赞贤的不是别人,就是反动的国民党右派。”“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要从这个事件里面,寻找我们的出路!出路!”4月,在赣南革命处于低谷时,汪群临危受命,来到被白色恐怖笼罩的赣州,继续陈赞贤未竟的事业。10月,中共江西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计划恢复和重建赣南各县的党组织,领导赣南农民开展武装起义,派遭省委候补委员汪群、萧韶等人来到赣州设立中国共产党赣南执行委员会,汪群任特委书记。汪群着手恢复了赣州织袜、泥木、缝纫、理发、西郊等6个直属支部,在郊区建立了东、南、西、北4个区委,开设了“工人俱乐部”。他还审时度势,主持召开了赣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创办了机关报《曙光》(后改为《红旗报》)。1928年2月,组织了影响巨大的赣县大埠农民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赣南工农革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28年10月18日,中共赣南特委驻地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汪群及其夫人贺服丹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对汪群施以酷刑,但他英勇无畏,甚至在敌人法庭上高呼:“我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

1929年1月,汪群和夫人贺服丹在赣州城卫府里英勇就义。